

● 语言哲学

多元和谐,交互共生^{*}

——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

何伟 魏榕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提 要: 国际生态话语是国际关系的语言表征,其分析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生态哲学观与生态哲学息息相关,但二者概念不同,生态哲学观作为一套系统性的观点,具有自身的特点。本文尝试通过阐释生态哲学观的特点,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及外交理念,建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哲学观,并讨论该生态哲学观对国际社会系统生态性发展的指导意义及其在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中的应用。

关键词: 国际生态话语; 国际关系; 生态哲学观 “多元和谐,交互共生”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6-0028-8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6.006

Diversity and Harmony, Interaction and Co-existence

— Ecosophy for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e Wei Wei 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discourse is a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nalysis of it should be guided by a proper ecosophy. The concepts of ecosophy and ecophilosophy are correlative, but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concept of ecosoph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tends to give a clear explanation of ecosophy,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ecosophy of “diversity and harmony, interaction and co-existence”, and to discuss its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sophy “diversity and harmony, interaction and co-existence”

1 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探索语言与生态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语言对各种生态关系的影响(Stibbe 2015, 黄国文 赵蕊华 2017)。国际生态话语是有关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话语,是国际关系的语言表征(何伟 魏榕 2017a, b; 魏榕 何伟 即出),对其进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语言与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揭示语言对国际关系、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国际生

态话语分析需要一定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何伟 魏榕 2017a)。本文主要探讨国际生态话语分析所依据的生态哲学观,重点在于生态哲学观概念的诠释、国际生态哲学观的建构、国际生态哲学观的意义及其应用。

2 生态哲学观

1973年,阿伦·奈斯(A. Naess)首次提出生态哲学观(ecosophy)概念,发动“深度生态运动”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语功能句法分析之计算机模式研究”(16YYB015)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706460082)的资助。

(deep ecology movement) (Naess 1973)。1989年,在《生态、群体与生活方式:生态哲学观的概要》(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Outline of an Ecosophy)一书中,奈斯对生态哲学观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词源上看,ecosophy是eco与sophy的组合。前者eco源于希腊语oikos,可译为“居住地”(household),即地球生命基地——生态圈(ecosphere);后者sophy源于希腊语sophia,代表智慧,因此,生态哲学观是有关地球生命基础的智慧(Naess, Haukeland 2002: 100),是有关生态学(ecology)的智慧。不过,生态学不是生态哲学观的唯一基础,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展示出地球上丰富多样的生命实际面临的各种困难,却并未详细地阐释保护生态的方式,也未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者必须做什么(同上:100-101)。生态哲学观的重点在于智慧,在于指导我们行动的智慧性行为准则。

生态哲学观与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奈斯认为,哲学(philosophy)蕴含两层意义:其一,哲学是一个研究领域,一种了解知识的方法;其二,哲学是一套个人化的价值观,引导其作出决定的世界观(Naess 1989: 36)。生态哲学取哲学的第一层含义,涉及生态的哲学研究;而生态哲学观取哲学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针对生态的哲学观点(同上:36-37)。生态哲学可能在哲学家的努力之下发展成深度生态哲学(deep ecological philosophy),也有可能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等群体的共同推动之下变成促进国际深度生态运动(international deep ecology movement)的学科(同上:4)。也就是说,生态哲学是一门学科,是一门与生态美学、生态正义学、生态实用主义等并列的哲学研究体系(郝栋 2016)。而生态哲学观就如生态美德一样,是生态哲学的主要外化形式。不管生态哲学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致力于生态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构自己的生态哲学观,以解决与自己实际情况相关的生态问题(Naess 1989: 37-38)。作为系统性的哲学观点,生态哲学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生态哲学观是一套为了追求生态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系统性、个人化的哲学观点(Drengson 2008: 3)。每个分析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态哲学观,其生态哲学观可能与其他人的生态哲学观相同、相近或者不同,就像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一样,不同的人也往往是不同的(黄国文 陈旻 2016)。例如,奈斯持“特费嘎斯汀生态哲学观”(Ecosophy Tvergastein)聚焦“自我实现”(self-realisation),主

要涵盖多样性、复杂性和共生性等重要特征(Naess 1989: 199-200);罗伯·霍普金(R. Hopkins)把“复原性”(resilience)作为生态哲学观的重要目标,希望在气候变化和石油减少的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免受国际经济影响,通过重建纽带与相互照看来满足自身的需求(Hopkins 2008);布勒登·拉尔森(B. Larson)的生态哲学观是“社会生态可持续性”(socio-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重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二者的持续性,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必须共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Larson 2011: 10);乔尔格·邦(J. Bang)的生态哲学观有关本地及全球文化,主要涉及合作、分享、民主对话、和平与非暴力、平等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特征(Stibbe 2015: 11);阿伦·斯提布(A. Stibbe)的生态哲学观为“生活”(living),关注福祉(wellbeing)、现在(now)和未来(the future)、关爱(care)、环境极限(environmental limits)、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复原性(resilience)等要素(同上:14-15)。

其次,生态哲学观不需要完全原创,它根植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中(Naess, Haukeland 2002: 101)。分析者可以从大量的经典文献中研读各种各样的生态哲学观,根据自己所在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提供的可利用证据来考察这些生态哲学观,然后融合或者延伸这些生态哲学观以重构自身的生态哲学观,亦或建构全新的生态哲学观(Stibbe 2015: 13)。例如,奈斯不仅融合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而且吸收佛教与斯宾诺沙的哲学思想等,最后创建“特费嘎斯汀生态哲学观”;加里·斯奈德(G. Snyder)融合佛教、“深度生态哲学观”以及莫理·布克金(M. Bookchin)的“平等社会生态观”,创建出自己的生态哲学观——自然(nature)、野外(the wild)、荒野(wilderness)(Bookchin 1981),其中自然是自然宇宙及其所有特征,野外是自然的有机过程与本质,荒野是人类世界以外的自然界(Messersmith-Glavin 2012);嵇康继承、调和并发展中国道家和儒家“万物齐一”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解的基础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生态哲学观,即名教是儒道思想改造的、合乎自然秩序的名教,而自然是一个统一而有秩序的整体(王丽慧 2014)。

再者,生态哲学观是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世界观(胡振亚 秦书生 2003),是我们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经济性理想(economic ideal),即以最简单的方式达到多样性目标(Naess 1989: 33)。借助于生态哲学观,我们

不仅能够实现对自然的保护(Naess 1973,曾和平等 2003,Stibbe 2015),而且可以达到其他多种目标。例如,生态哲学观可以帮助我们将自然关怀与环境思维引入政治维度,进而打造绿色政治(王彩波 屈冬梅 2008);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即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赵卯生 杨晓芳 2010);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低碳经济的内涵与外延,最终塑造低碳社会环境(周媛 彭攀 2010);可以激发我们对旅游的思考,从而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Varley,Medway 2011);可以应用于教学实践,进而提高教学质量(Greenhalgh-Spencer 2014)。

生态哲学观不仅是复杂和深奥的,而且随着分析者接触新观点、发现新证据以及获得新体验而不断演化(Stibbe 2015: 13 - 14)。一个人的生态哲学观是其在生活中慢慢形成的,与其出生的环境、成长氛围、所在的特定社会体制、受教育情况、自己的信念、意识形态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黄国文 赵蕊华 2017)。例如,奥尼尔整个戏剧创作生涯都贯穿着生态哲学观的演变。奥尼尔的早期剧作中,人类被置于自然的对立方,带有“人本主义”思想的烙印;中期作品体现出其生态哲学观的转变,至此人与自然不再有主客之分,彼此相生相长,达至和谐;后期更是受到中国老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不仅展现出诗意回归的大道色彩,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道家生态精神,而且将精神生态诠释得淋漓尽致(吴宗会 2015)。

总之,生态哲学观是系统性的、个人化的、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可持续性的、进化性的,这些主要特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可或缺。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分析者可能提出不同的生态哲学观,例如,默里·布克金(M. Bookchin)就社会生态提出“平等社会生态观”(Bookchin 1981);张壬午等就农业生态提出“天人合一”生态观(张壬午等 1996);苏珊·贝克(S. Baker)关于自然—社会生态提出“可持续发展观”(Baker 2006);王学渊和李忠健就市场经济生态提出“均衡观”(王学渊 李忠健 2007);马克·斯古罗尔(M. Schroll)针对人际生态提出“心理生态观”(Schroll 2013);果扎罗·沙拉扎尔(G. Salazar)和丹尼拉·加拉贝尔特(D. Jalabert)针对城市生态提出“景观生态观”(Salazar, Jalabert 2016);何伟和张瑞杰就自然生态提出“和谐场所观”(何伟 张瑞杰 2017)。即使针对同一生态系统,分析者也有不同的生态哲学观。就国际社会生态系统而言,存在“和平观”(Mowat 1935)、“交流观”(Jonsson, Hall 2003)、“多样化”

(Masamichi 2004)、“和谐观”(Li 2010)、“健康观”(Katz et al. 2011)、“合作共赢观”(Alves 2013)、“和而不同、互爱互利”(何伟 魏榕 2017a, b)等多种生态哲学观。其中“和平观”“多样化”“和谐观”“健康观”突出国际生态系统的存在状态,为静态描述,“交流观”和“合作共赢观”展现国际生态系统的互动状态,为动态描述,它们只是展示出国际生态系统的单维度状态,未能体现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维护其和谐平衡的困难性。尽管“和而不同、互爱互利”包含“和而不同”的静态维度与“互爱互利”的动态维度,不过该生态哲学观表述依然不够准确。因此,为全面揭示话语对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我们需要建构全面而系统的国际生态哲学观,这种生态哲学观不仅需要融合静态维度与动态维度,而且必须能够为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发挥建设性的指导作用。

3 国际生态哲学观的建构

中国哲学蕴含着丰富的、颇有建设性的国际生态哲学思想。事实上,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我们应该“回到原点”,即“回归传统”,走向未来;中国哲学文本是开放的生态哲学文本,我们需要开放心胸,使中国哲学走进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发挥其生命潜力,为人类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蒙培元 2004: 2)。中国哲学传统关注“究天人之际”(同上),其实质不只是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要探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文本中建构适宜的国际生态哲学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不仅指体现中华民族文化核心的哲学思想,而且涉及中国外交理念(李存山 2014)。

首先,“和谐”不仅在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学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肖刚 2006),而且是中国外交新篇章的主旋律(黄庆 2012)。在古汉语中,“和”与“谐”同义,“以和邦国,以谐万民”(《周礼》)意指唯有和谐才能稳定国家与国民,才能确保国际社会的稳定。“和为贵”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天人合一”又把“天、地、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人类、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也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有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讲的是国家必须重视睦邻友好关系,而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平,乃立贞节。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主张的也是国家之间和谐相处,万邦友好

(于春梅 2007)。就道家来说,“道法自然”(《老子》)阐述出一种和谐的思想,即国与国之间只有相互和谐、自然相处,才能打造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持久和平境界(刘雅文 2008)。墨家的“兼相爱”(《墨家》)指人民应该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亦指国家应该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地爱所有国家,通过不同层面行为体之间的和谐相处来推动天下大治的实现,达致世界的和谐(付启元 2015)。总之,“和谐”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主线,这个主线正是在中国传统“和”的哲学精华中逐渐形成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新时代之和谐外交(吴坚 陈雷雷 2006)。

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的文化,不过这种和谐文化既不是一元论的文化,也不是强调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文化,而是崇尚多元文化(付启元 2015)。也就是说,中华和谐文化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的“和”,是兼顾多方面利益而崇尚协调的“和”,因而在实质上是兼容多元的“和”(吴光 2008)。“多元”是“和”具备真正内涵与意义的前提。“和而不同”最初出现于“君子和而不同”(《论语》),意指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有别的情况下保持和谐状态。“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一方面指出和谐是万物创生的基础,一方面强调“不同”是万物繁衍的必要条件,如果“去和而取同”,一味追求“同”,那就会导致“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从而使万物失去生存的机会(刘恩允 2011)。万物,小到世间尘埃,大到国家,唯有多元化与多样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同样,道家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的也是万物的差异与互补为“和谐”的前提,而且“多元化”是道家重要的美德伦理,对当代全球化的多元社会生活极具价值(黄勇 2011)。墨家提倡“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墨经》)与“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墨经》),指同与异相互依存,同形成于不同之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楚辞·卜居》),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各国只有以“不同”或“多元”为前提,国际社会才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和谐发展态势。“多元和谐”不仅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哲学传统的重要思想,是处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秋芳 2017),也

是“新时期中国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标(骆珺 冯千 2017)。

“多元和谐”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就是须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树立亦此亦彼的和谐共存思想。“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万物一体”是中国生态哲学的最高成就(蒙培元 2010),这里所说的“万物一体”即为万物“共生”,即“共同生存”,它不只是人的主观意境,更是万事万物存在的过程,只有实现真正的和谐,才能达到“共生”的境界。儒学思想,不管“万物一体”,还是“天人合一”,都蕴含着“共生”思想。如自然界一样,国际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各个国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有机系统,因而都是“共生”状态。道学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意指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应该具有水一般的品质:第一,柔;第二,停留在卑下的地方;第三,滋润万物而不相争(陈鼓应 1984)。而这种用至诚的心、积极助人的态度处世与看待国际关系,自然可以在任何形势下创建起“共生”的社会。墨家认为,“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也就是说,各个国家需要相互爱护,便能达到“互利共生”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包含相互依存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是一种新的“共生观”(马丽蓉 2014)。这种新的“共生观”涵盖“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天下观、“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和合观、“仁者爱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的“仁爱观”,“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观”,“厚德载物”的“厚德观”与“言必信,行必果”的“守信观”等重要人文精神。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之间应该是多元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蕴含在“交互共生”的过程之中。换言之,“多元和谐”是国家之间的静态维度,“交互共生”是国家相处的动态维度,“共生”是一种过程,“交互”,即“交流互动”也是一个过程。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关注点(Wendt 1999: 21)。儒学重视“交互”,这种“交互”基于文化,如儒家相信“天下明德自虞帝始”,认为交互始于“虞帝之世”的华夏文明创生时期;基于道德,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就是说国家以德行感化天下,其他国家自然也就纷纷效仿;基于礼义,如“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表面上看只是说君王好礼,国民自然敬重他,实际上也指国家之间的

交往模式:国家好礼,其他国家自然敬重之。道家注重“阴阳互动”,这种互动是多元协调,互施互变、相谐相和的。老子曾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在互相补充、互施互化与彼此融合基础上生成太和境界,生化万物(祝彩云 2005)。墨家的“兼相爱”之“兼”重视的就是“相互爱护”,必须“交互”,才能“相爱”。也就是说,“兼爱”不是单方面的行为,需要相关行为者都采取同样的行为才是有效和合理的(邵显侠 2015)。另外,墨家的“交相利”也是强调“交互”,墨子认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指的就是,只有爱对方,才能从对方那里得到爱与利益。“交互”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要素,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外交践行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军事交互(韩献栋 金淳洙 2008)、人文交互(赵可金 2011)、经济交互(李巍 孙忆 2014)等多方面。

总之,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始于生态,发达于生态,具有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内容(霍功 2009)。基于此,我们从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践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外交理念中建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哲学观。

4 国际生态哲学观的意义:生态国际社会的产生

作为生态哲学观,“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具备系统性、社会性、文化性、可持续发展性、进化性等特征。作为国际生态哲学观,“多元和谐,交互共生”融合“多元”和“和谐”之静态维度与“交互”和“共生”之动态维度,不仅阐述国际社会生态系统中各成分自身应有的状态,而且陈述生态系统中成分之间的相处过程。更重要的是,“多元和谐,交互共生”是从“和而不同,互爱互利”完善而成,它更加有助于维护国际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推动国际社会的生态化,从而促使人们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人”(黄国文 2016),促使国家变成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国”,进而促使国际社会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国际社会”。那么,“生态国际社会”是什么?“生态国际社会”即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国际社会,其达成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生态国际社会”反映出国际社会的进化。基于遗传的原理,凡是被选择的有利性状,将在世代传递过程中积累保存,最终发生演变与进化(陈世骧 1965)。自从雷切尔·卡森(R. Car-

son)发表著名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人类社会逐渐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全球化的生态思潮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生态转向”,“生态化”也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Stibbe 2010: 407)。当今全球面临非政府组织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环境污染等众多新问题,本文希望各国和地区均能选择生态化作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促进国际社会发展成“生态国际社会”。以生态为基本特点的国际社会,将以整体论,即以“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为指导原则,摒弃个别国家主张的绝对化、单向性和片面性,强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存在与发展为指南,以“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作为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处的理念。

第二,“生态国际社会”体现出生态哲学观的升华。如上文所言,当代国际社会面临非政府组织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息息相关。而行为均受到意识的指导,作为意识范畴的国际生态哲学观正是支配国际社会成员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上文提及的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一些成员的生态哲学观不够科学、不够理性、不够系统造成的。因此,“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体现出国际生态哲学观的进步与升华,可以促使国际社会进化成“生态国际社会”。

第三,“生态国际社会”预示着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创新。一直以来,范式被认为是任何一个既有的学科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Kuhn 1970),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范式的主要功能和意义在于为学科研究的形成提供内聚力,促进学科研究的系统化与常规化,而新旧研究范式的更替代表着学科研究的革新。国际关系理论从其产生就进入范式研究状态,目前对其研究影响最大的堪称3大理论范式,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并且它们处于长期争论中,为解决范式研究的困境,目前国际关系出现范式融合趋势(刘胜湘 2014)。所谓范式融合指同时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范式来探讨国际关系问题。范式融合有一定的优势,如理论选择多样性、解释更加全面、各种范式可以相互补充等(同上),不过目前国际关系范式融合选择中并没有生态学角度的研究范式。因此,我们尝试从生态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建立国际社会生态系统(何伟 魏榕 2017b),建构国际生态哲学观,分析国际生态话语,促进国际社会

的和谐共生,这可以称之为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一种创新。

5 国际生态哲学观的应用

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出发,对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背后的识构及发话者的生态哲学观(黄国文 陈旻 2016)。反过来,生态哲学观也会影响我们的话语,指导我们的行为,因为话语正是我们生态哲学观的体现,也是我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而“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哲学观不仅能够促成“生态国际社会”的产生,为国际生态话语分析建构明确的生态哲学理念,且为我们的一言一行提供正确的生态哲学指导方针。根据“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哲学观,我们可以判断国际生态话语中蕴涵的生态意义,进而将国际生态话语分成3类:有益性、破坏性和中性。其中,有益性话语符合本文生态哲学观,破坏性话语违背本文生态哲学观,中性话语既不符合也不违背本文生态哲学观。比如,我们对例①至③的分析^①,这3个例子都是英语媒体就中国“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影响发表的评论。

① OBOR could stimulate Asian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make it more sustainable. In particular, countries along the corridor — especially those with under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low investment rates, and low per-capita incomes — could experience a boost in trade flows and benefit from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② OBOR matters relatively little. The initiative itself is ill-defined and has done very little for China since it was announced. Even if it's successful, OBOR won't sw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③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ets to develop the global economy by connecting with trading partners along ancient Silk Road.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旨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包容的合作共赢体系,目前已经为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张辉等 2017)。例①包含两个句子,4个小句,说明“一带一路”能够促进亚洲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事实,而且展示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该倡议中获取的切身利益,契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为有利于全球和谐与国际社会生态系统平衡的有益性语篇。例②包含3个句子,6个小句,第一句话发表说话者的观点——“中国‘一

带一路’没有多大意义”;第二句话解释其观点——“中国‘一带一路是一个不确定的计划,自其宣布以来对中国自身都没有多大作用”;第三句话以转折递进的方式补充说明前两句话——“即使中国‘一带一路是成功的,它也无法影响世界权势的均衡”。事实上,这意味着持有“与世界合作共赢”明确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成功的。例②中的第一和第二个句子表述的观点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相矛盾,与其他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事实相矛盾,第三个句子强调“中国‘一带一路的成功无法影响世界权势的均衡”,说明作者在揣测中国想借“一带一路”来夺取世界霸权的意图,这有悖于中国“不称霸”的外交策略(庞中英 2015)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汪朝晖 2015)。综上所述,例②中3个句子均不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国际生态哲学观,都属于破坏性国际生态话语,因而是一个不利于维护国际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破坏性语篇。例③客观地陈述“中国打算通过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紧密联系而发展世界经济”的事实,属于中性国际生态语篇。

6 结束语

国际生态话语是国际关系的语言表征,而通过话语分析来研究国际关系,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本文基于蕴涵丰富生态智慧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践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外交理念,建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哲学观。我们认为,在这种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的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不仅符合中国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而且适合全球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作为识构解读和信奉践行依据,这种生态哲学观可以通过对话语类型的区分以及对有益性与破坏性话语的积极与负面作用的识解,提高人们对国际社会生态问题的认识,从而倡导人们改善国际生态话语行为。从建构主义角度讲,积极有益的话语行为能够促动人们自觉地维护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选语料均来自互联网。

参考文献

-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陈世骧. 生物进化论: 进化论的发展历史和实践意义[J]. 科学通报, 1965(8).

- 付启元. 和平学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和平思想[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3).
- 韩献栋 金淳洙. 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2).
- 郝 栋. 美国生态哲学的体系建构与实践转向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3).
- 何伟 魏榕. 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建构[J]. 现代外语, 2017a(5).
- 何伟 魏榕. 国际生态话语的内涵及研究路向[J]. 外语研究, 2017b(5).
- 何伟 张瑞杰.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J]. 中国外语, 2017(5).
- 胡振亚 秦书生. 生态哲学——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世界观[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
- 黄国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J]. 中国外语, 2016(5).
- 黄国文 陈 旻. 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J]. 外国语文, 2016(6).
- 黄国文 赵蕊华.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 现代外语, 2017(5).
- 黄 庆. 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谱写中国外交新篇章[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2(5).
- 黄 勇.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庄子》中的道家美德伦理[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 霍 功.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生态文明[J]. 道德与文明, 2009(3).
- 李存山. 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中华民族精神[J]. 哲学研究, 2014(12).
- 李 巍 孙 忆.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J]. 外交评论, 2014(4).
- 刘恩允. “和而不同”与“天下观”——儒家对话自由主义的生命社会观[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2).
- 刘胜湘. 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12).
- 刘雅文. 道家文化与和谐文化构建[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 骆 珺 冯 千. 刘晓明在英宣介中国外交新走向[OL]. 新华网, 2017-09-20.
- 马丽蓉. 中阿“共生观”: 从理念到实践的成功建构[J]. 世界宗教文化, 2014(4).
- 蒙培元. 人与自然: 中国哲学生态观[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蒙培元. 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6).
- 庞中英. 中国外交的“不”与“有”[J]. 世界知识, 2015(13).
- 邵显侠. 论墨家的非攻论与兼爱论——一种全球伦理的视角[J]. 伦理学研究, 2015(1).
- 王彩波 屈冬梅. 绿色政治: 将自然关怀与环境思维引入政治维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3).
- 汪朝晖.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探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6).
- 王丽慧. 嵇康的生态哲学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10).
- 王学渊 李忠健. 市场经济生态之浅见[J]. 特区经济, 2007(1).
- 魏榕 何伟. 国际生态话语之介入系统分析模式建构[J]. 即出.
- 文秋芳. 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评析习近平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J]. 外语学刊, 2017(3).
- 吴 光. 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J]. 扬州大学学报, 2008(6).
- 吴 坚 陈雷雷. 和谐外交: 中国外交新时代[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6(5).
- 吴宗会. 问道与寻道: 生态主义视域下的奥尼尔戏剧信仰嬗变[J]. 外语教学, 2015(2).
- 肖 刚. “和谐世界”: 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J]. 国际论坛, 2006(6).
- 于春梅. 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J]. 理论探讨, 2007(3).
- 曾和平 赵敏慧 杨树华 杨礼攀 张建萍. 生态哲学与自然保护[J]. 生活经济, 2003(10).
- 张 辉 易 天 唐毓璇. 全球价值双流研究[J]. 经济科学, 2017(3).
- 张壬午 张 彤 计文瑛. 中国传统农业中的生态观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J]. 生态学报, 1996(1).
- 赵可金. 人文外交: 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J]. 外交评论, 2011(6).
- 赵卯生 杨晓芳. 生态批判·制度超越·人的解放——福斯特建构政治生态哲学的三重维度[J]. 东岳论丛, 2010(7).
- 周 媛 彭 攀. 生态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低碳经济[J]. 理论月刊, 2010(4).
- 祝彩云. 关于我国道家阴阳互动与黑格尔辩证法差异的思考[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8).
- Alves, A. C. China's 'Win-win' Cooperation: Unpacking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for Resources Deals in Africa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2).

- Baker, 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Bookchin, M. *The Ecology of Freedom: The Emergence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 [M]. Palo Alto: Cheshire Books, 1981.
- Carson, R. *Silent Spring*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2.
- Drengson, A. The Life and Work of Arne Naess: An Appreciative Overview by Alan Drengson [A]. In: Drengson, A., Devall, B. (Eds.), *The Ecology of Wisdom: Writings by Arne Naess* [C]. Berkeley: Counterpoint, 2008.
- Greenhalgh-Spencer, H. Guattari's Ecosophy and Implications for Pedagogy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4(2).
- Jonsson, C., Hall, M. Communication: An Essential Aspect of Diplomacy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03(2).
- Katz, R., Kornblet, S., Arnold, G., Lief, E., Fischer, J. E. Defining Health Diplomacy: Changing Demand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J]. *Milbank Quarterly*, 2011(3).
- Kuhn, S. T.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Larson, B. *Metaphors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e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Li, Z.-X. Harmony and Chinese Diplomacy [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5).
- Masamichi, S.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Jap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4(1).
- Messersmith-Glavin, P. Between Social Ecology and Deep Ecology: Gary Snyder's Ecological Philosophy [A]. In: Elkholy, S. (Ed.), *The Philosophy of the Beats* [C].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2.
- Mowat, R. B. *Diplomacy and Peace* [M].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35.
- 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J]. *Inquiry*, 1973(16).
- Naess, A.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Outline of an Ecosoph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Naess, A., Haukeland, P. I. *Life's Philosophy: Reason and Feeling in a Deeper World*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 Salazar, G., Jalabert, D. Towards a Landscape Ecosophy. Interpreting How the Villarrica-Pucón Urban System Inhabitants in the Araucanía Region of Chile Perceive and Relate with the Dynamics of Landscape [J]. *Brazilian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2016(1).
- Schroll, M. A. From Ecopsychology to Transpersonal Ecosophy: Shamanism, Psychedelics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A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Ecopsychology*, 2013(4).
-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and Globalization [A]. In: Coup-land, N.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C].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0.
-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Varley, P., Medway, D. Ecosophy and Tourism: Rethinking a Mountain Resor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4).
- 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定稿日期: 2018 - 10 - 25

【责任编辑 谢群】